

晚清才女的成長歷程—— 以安徽旌德呂氏姊妹為中心*

秦 方**

摘 要

本文通過對安徽旌德呂家四姊妹的個案研究，試圖建構一幅近代才女的早期生活圖景，探討她們在童年和少女的生活經歷中，通過怎樣的途徑，接受了哪些教育，受到哪些影響，形成其日後才女身分並構成其相關知識體系。作者認為，在呂家四位女兒成長過程中，父親與母親在其經歷和知識來源上扮演了不同角色。父親代表了一種（儒家）權威性的形象，其仕途的起落決定了女兒們幼年教育的場所、方式以及智識層面。而經由父親所傳遞的時事性知識，成為她們在實際生活中體驗閨閣之外世界的重要來源。同時，以父親去世為標誌的家變使得四個女兒的物質生活、心理感受乃至日後的人

* 本文在前期研究及撰寫過程中，承蒙指導教授 Ann Waltner 提供寶貴意見，學長潘宗億及胡祥雨閱讀初稿，又蒙兩位匿名評審指正，僅此一併致謝。

**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PhD Candidate).

生軌跡都出現了相當劇烈的變化。在另一方面，母親更多地代表了一種普世性、道德性思想的來源，其關於佛家慈悲戒殺的思想、因果輪迴的神秘主義和宿命論以及堅韌、貞潔、慈愛等傳統女性思想的傳遞，在很大程度上鋪墊了四個女兒生活經驗的基本色調，使得呂家母女關係表現出一種延續性和穩定性，構成了閨閣文化傳延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晚清、才女、童年、知識結構、閨閣文化

就中國婦女史研究領域而言，閨閣女性向來受到文史學家的青睞，尤其是前近代江南地區的才女群體，留傳後世的詩詞文集，為日後學者探討她們的人文世界以及其與和現實世界之互動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素材。¹ 同時，很多學者也十分關注在近代這樣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裡，這些傳統意義上的閨閣女性面臨著怎樣的挑戰和衝擊，以及她們在這些變化中如何傳承、延續其賴以生存的閨閣文化，形成一種新舊雜糅的身分。² 這些學者的研究為我們理解閨閣才女以及女性文化的歷史變遷，尤其是自明清以降，提供了深刻的借鑒。

但是，就這些女性自身的生命歷程和階段而言，現有研究尚有未盡如人意之處。其中最大的空白，就在於這些女性的童年及少女時期生活

1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llen Widmer and Kang-i Sun Chang,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Hu Ying,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Grace Fong, Nanxiu Qian, Harriet T. Zurndorfer, eds., *Beyon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Gender, Genre, and Cosmopolitanism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04); Joan Judge,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經歷，似乎才女之所以成為才女，就始於那個鋪紙揮墨的時刻，而在這一轉折點之前的歲月，則是白紙一張，少有著墨。³ 這一空白，可以從幾個方面來進行理解。首先，對於大部分壽命較長、著作頗豐的才女們而言，她們的創作高峰期往往和生命歷程的成熟期相吻合。因此，絕大多數的詩詞文篇都在記述她們關於婚後生活或者是為妻為母的歲月，偶爾有關於童年時期或者初露頭角時期的作品，只以一種追憶的方式來反襯「她們婚姻中的孤獨、孤單和情感上的隔絕」，⁴ 往往有美化之嫌；在數量上，也無法與其成熟時期的作品相比擬，因此，未能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再者，如果不從婦女史的角度來考慮，而是從兒童史的視角來考察更為普遍的女性群體的童年和少女時期，學者們則陷入一個更為困難的境地。在兒童史研究的領域中，對於同年齡階段的男童，不管是從討論的範圍還是研究的深度，都遠遠超過對於女童的關注。⁵ 而少數幾個和女童生命歷程頗有關聯的題目，則多集中於溺嬰習俗上。⁶ 女童們雖與男孩生活在同一屋簷下，但是，她們的童年生活並未引起研究者應有的關注。

在學術版圖中，女性這種生命歷程的斷裂以及童年生活的蒼白，並非無法破解。近年來，已有學者開始探索不同的材料、方法和視角，試

3 關於此研究的缺乏，請參見 Ping-chen Hsiung,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83-184.

4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p. 13.

5 相關著作十分豐富，在此僅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論作。Angela Ki Che Leung,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381-416; 熊秉真，〈好的開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2），頁 201-238；Pei-yi Wu,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Sung,"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eds.,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307-324.

6 Ann Waltner, "Infanticide and Dowry in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in Anne Behnke Kinney ed.,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p. 193-217; David E. Mungello, *Drowning Girls in China: Female Infanticide Since 165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圖改變目前的研究狀態。這一努力，首推兒童史研究專家熊秉真。在其新近力著 *A Tender Voyage*（《慈航》）一書中，作者為女童專闢一章，並就經典規範、普遍生活、父、母女關係等方面進行研究，勾勒出經典中重男輕女而實際生活中父母同樣或更為珍惜女兒的悖論。但是，由於熊秉真將主要精力置於儒家經典的闡釋上，對於女性早期教育的其他選擇則鮮少提及。再者，該章所用材料大部分集中於男性文人的記事和追憶，女性自己的聲音並未凸顯出來，因此，就實際生活層面而言，還是留下了很多可供發揮的空間。除此之外，熊秉真、Charlotte Furth 等學者還從醫療史的角度來探討對兒童疾病的治療和兒童身體的護理。儘管其意不在刻畫兒童的生活經歷，但是，她們卻在很多方面以新鮮的視角為讀者再現兒童的生活。⁷ 然而，其論述大多集中於初生和幼年時期，對於我們理解才女如何成為才女這一問題並無太大幫助。

學者 Susan Mann 也曾撰文探討 17、18 世紀上層家庭中女性的成長階段。然而，相較於其筆下女性的婚後及老年生活，這些女性的童年時期並未有太多著墨。⁸ 但是，這一情況在其新作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張家才女》）中有很大的突破。在該書中，作者採用「史者曰」的方式，勾勒出張家三代才女的人生歷程。在其情景設置的部分中，Mann 以想像的筆觸，融合其對前近代女性早期教育的理解，以三代才女所留文字為基礎，構建起大量的細節、對話和動作，將才女們各個階段的生活娓娓道來，賦予其鮮活的特性。但正是這些鮮活的描述，讓人在享受情景的同時，不得不將很多精力用來區分史實和想像的邊界。⁹

儘管存在種種問題，但是，這些學者們的努力，無疑是具有開創性

7 Charlotte Furth, "Concepts of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 1 (February 1987), pp. 7-37; 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

8 Susan Man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in the Mid-Ch'ing Period," in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19-49.

9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的。而本文正是在前輩學者的研究基礎上，試圖建構起一幅近代才女的早期生活圖景，探討才女們在童年和少女生活經歷中，通過怎樣的途徑，接受了哪些教育，受到哪些影響，以促成其日後才女身分及相關知識體系。

一、選題與材料

鑒於前輩學者的經驗和問題，本文決定以個案研究的形式，選取安徽旌德呂家的四位女兒惠如(1875-1925)、美蓀(1881-1945)、碧城(1883-1942)、坤秀(1888-1914)，來探討在「吾家有女初長成」的過程中，其童年和少女時期經歷及教育對其知識結構——尤其是才女身分的影響。

這樣的個案選擇，主要是出於以下的考量：首先，和前近代不同的是，在近代，鮮有家庭像呂家這樣，同時出現四位被冠以才女之名的女兒。尤其是惠如、美蓀和碧城，在其鼎盛時期，有「淮南三呂，天下知名」之美譽。這樣一個較為整齊的才女群體的成長，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其家庭環境和教育中一些共時性和延續性的內容。其次，呂家四位女兒，命運有合有分，但就和其才名最為密切相關的女子教育而言，卻有一致性。在其聲名嶄露初期，四個姊妹都先後參與創辦或者任教於女學之中，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女性教育家。這樣的女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和其童年及少女時期接受的家學教育有很密切的聯繫。因此，研究呂氏姊妹的家學教育，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近代女性從家庭教育走向學校教育的轉變軌跡。再次，就學術研究層面而言，近年來對於惠如、美蓀和碧城的研究日漸增多，但是，學者們多關注她們在成名之後的人生經歷，鮮少有人提及其早期生活。¹⁰ 在筆者看來，其童年的經歷，對於她們日後的成名，有著不可或缺的影響，因此，本文也希望通過對呂家姊妹童年

10 對呂碧城童年稍有提及的文章，見 Grace Fong,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Or A Classical Woman of Modern China: The Challenging Trajectory of Lü Bicheng's (1883-1943) Life and Song Lyrics," in Grace Fong and Nanxiu Qian, Harriet T. Zurndorfer, eds., *Beyon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p. 12-45; 劉納編著，《呂碧城：評傳、作品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頁 3-7。

和少女時期經歷的展現，彌補以往的學術空白。

最後，必須要說明的是，選擇呂家四姊妹，也有在材料方面的實際考慮。呂家四姊妹以才女聞名於世，再加之近代媒體印刷的力量，大量關於她們的評論得以保留下來，為我們拼湊出其童年及少女時期生活經歷提供了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呂家四姊妹本人也有相當數量的文字付梓，尤其是美蓀和碧城這兩位在呂家最負盛名的女性，存世作品較為宏富。美蓀和碧城對於自己「名」和「文」的保存和流傳有著強烈的焦慮感。碧城嘗言「予慨世事難虞，家難奇劇，凡有著作，宜及身而定，隨時付梓，庶免身後湮沒。」¹¹ 而美蓀更是直接明言，「人生於世，須留遺迹，古人稱三不朽，立德立功尚矣，即立言亦烏可少者？」¹² 這種焦慮感不僅使她們二人留下的文篇最多，也間接地將惠如和坤秀的部分詩詞作品保存下來。¹³

本文對於呂家四姊妹童年及少女時期生活經歷的建構，主要基於對美蓀和碧城文字的解讀。因此，我們必須要對這些材料有一個較為警醒的認識。就目前所見資料，美蓀和碧城對於自己家事和家史的寫作，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相較而言，呂碧城很少在行文之中特意提起自己的家庭，而是將蛛絲馬跡淹沒於不直接相關的主題之中，使得讀者經常會有一種意外發現之驚喜。即使所提到的內容，也多是以自我為中心，和自己的經歷直接相關。這種稍嫌隱晦的態度和二姊美蓀的坦白、直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¹⁴ 以呂美蓀的《菟麗園隨筆》一集為例，其中有相當

11 呂碧城，《曉珠詞·自跋》，轉引自李保民編著，《呂碧城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525。

12 呂美蓀，《菟麗園隨筆·自序》（青島：著者自刊，1941）。

13 根據碧城記載，惠如「歿時家難糾紛，著作湮沒，遺稿之求，列入訟案。」經過碧城多方搜集，最後只得其詞作二十四首，因無法單獨成冊，只得《惠如長短句》為名，附於其1937年出版的《曉珠詞》後。本文所用的《曉珠詞》版本是1970年由臺灣廣文書局的再印版本。而坤秀詩稿在滬被竊，只有少數詩作附於美蓀為父編輯的《靜然齋雜著》。

14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美蓀、碧城皆善於文，但是二人文字之間鮮少提及彼此。筆者推斷這與兩姊妹成年後因故失和有關。碧城曾在其出版的《曉珠詞》中言：「予孑然一身，親屬皆亡，僅存一『情死義絕』不通音訊已將卅載者。其人一切行為，予

篇幅是直接以其家史或家事來命名的，如〈記先大夫葬親事〉、〈先外王母嚴太夫人先從母余太夫人孝行〉、〈蔣夫人示夢繼室〉、〈嚴太公〉、〈美蓀自記三生因果〉、〈母妹陰靈〉和〈記舅氏嚴朗軒太守幼時事〉等。這些篇章並未單獨成卷，而是分散在整個文集中，與其他美蓀聽來的奇聞軼事並置。從這些題目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美蓀所談及的家史，不僅是父系這邊的親戚，還包括母親娘家的先輩。而且，美蓀在文章中，並不為親者、長者諱，她甚至在〈記先大夫葬親事〉篇中認為，呂家的衰落和家人的短命，在很大程度上都由於父親選擇祖墳不當所致。美蓀與碧城對於家史和家事迥然各異的寫作風格，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但是，限於本文的篇幅和重點，在此僅簡要說明，這主要是由二人幼時和父母雙親關係的親近程度，以及經歷喪父離家等家變後身分轉變不同所致。

由於呂家四姊妹出生年月前後相差十三年，因此，在如何界定「童年」及「少女」時期上存在一定的複雜性。比如當最小的坤秀七歲時——生理及儀式意義上幼女的年齡終點，¹⁵ 最年長的惠如已臻二十歲，到了適婚的年齡，而中間的美蓀和碧城則處於少女時期。有鑒於此，本文決定以 1895 年作為一個大致的界限。這樣的考慮基於以下因素：這一年，坤秀剛好七歲，正值幼年的年齡邊緣。更重要的是，呂父鳳岐突然因病去世。伴隨這一變故而來的是呂家家產被奪，幾個女兒被迫分離，或嫁為新婦，或寄人籬下，或外出謀生，她們的人生經歷和社會身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換言之，這一年對於呂家姊妹而言，不管是實際年齡、物質生活或是心理層面，都可以視為一種無憂少女生活的結束。需要指出的是，有時為行文需要，某些個例的選擇會超越 1895 年。

基於上述這些考量，本文的行文結構大致分為如下幾個部分。首先，筆者試圖釐清一個關鍵性的身分形成問題，即呂家四姊妹「才女」的認定過程。才女這一身分，基本上是一個他說而非自說的概念。我們今日所看到的呂氏姊妹，其才女聲名早已根深蒂固。但是，若將其置於歷史

概不欲聞；予之諸事，亦永不許彼干涉。」但箇中緣由，仍值得進一步探索。呂碧城，〈前調〉，《曉珠詞》，卷 3（臺北：廣文書局，1970），頁 43。

15 Ping-chen Hsiung, *A Tender Voyage*, pp. 184-185.

脈絡中，我們會發現，這一身分的形成，並非橫空出世，而是一個逐漸累積和建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儘管時人評論各有側重，但是，幾乎毫無例外地，他們都提及了呂家姊妹的家庭背景和家學淵源，似乎呂家姊妹的早期生活經歷是她們四人成為才女不言自明的條件之一。因此，若要理解呂家姊妹的才女身分，其童年和少女時期是一個無論如何也不能忽略的生命階段。

其次，在這一才女身分定位的基礎上，筆者回溯過去，以呂氏自己的文字為經緯，探討在呂家四位女兒的成長過程中，父親與母親在其早年經歷和知識來源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少年家變對於她們的自我和社會身分認同等產生的重要影響。筆者認為，在呂家女兒成長及知識體系形成的過程中，父親代表了一種（儒家）權威性的形象。父親在仕途上的起落決定了女兒們幼年教育的場所、方式以及智識層面的豐富性。而且，經由父親所傳遞的時事知識，成為她們體驗閨閣之外世界的重要來源。父親的影響為她們日後在社會中的嶄露頭角埋下伏筆。在另一方面，相較於父親，母親更多地代表了道德思想的來源，其關於佛家慈悲戒殺的思想、因果輪迴的神秘主義和宿命論以及堅韌、貞潔、慈愛等傳統女性思想的傳遞，在很大程度上鋪墊了四個女兒生活經驗的基本色調，使得呂家母女關係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延續性和穩定性，構成了閨閣文化傳延的重要因素。

二、淮南三呂天下知名

1927年，章士釗在其編輯的《甲寅》雜誌中寫道：「曩淮南三呂，天下知名。」¹⁶ 呂家的四個女兒，除了最小的坤秀於1914年因病過世、聲名不彰外，惠如、美蓀和碧城在各自的領域中早已獨領風騷。惠如在女子教育界頗有地位，曾擔任女視學官，負責考察江浙魯皖的女學情況。¹⁷ 美

16 章士釗，〈巽言·跋〉，《甲寅》，卷1號43（1927年1月），頁19。

17 〈中央特派女視學分巡各省〉，《教育雜誌》，卷7號12（1915年12月），頁106-107。

蓀在輾轉天津、奉天、廈門各地女子學校後，任教於南京女子師範學校，並在南京漢西門黃泥巷築菡麗園，與包括梁啟超、趙爾巽、王揖唐、樊增祥等眾文人詩詞神交，日後陸續出版《菡麗園詩》及其續編，飽受讚譽。¹⁸ 而碧城則在辭去北洋女子公學校長、袁世凱政府公府秘書等職後，前往上海，積累相當財富後，暢遊美洲歐陸，一隻彤管寫盡天下風光。¹⁹ 事實上，對於同出一枝卻各有擅長的三位女性，像章士釗這樣的讚歎之詞，並不在少數。我們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4 年——當呂氏三姊妹初在社會中嶄露頭角之時。

1904 年 5 月 8 日，當時居住在塘沽舅父嚴朗軒家中的呂碧城為求學故，和舅父發生爭執，獨自前往天津，並因緣巧合，結識了時任《大公報》總經理的英斂之及其夫人愛新覺羅·淑仲。

塘沽距津甚近。某日，舅署中秘書方君之夫人赴津，預約與同往，探訪女學。瀕行，被舅氏罵阻。予忿甚，決與脫離。翌日逃登火車，車中遇佛照樓主婦，掣往津寓。予不唯無旅費，即行裝亦無之，年幼氣盛，挺而走險。知方夫人寓大公報館，乃馳函暢訴。函為該報總理英君所見，大加嘆賞，親謁邀與方夫人同居，且委襄編輯。²⁰

5 月 24 日，大姐惠如擔心碧城隻身在津，也從塘沽來到天津；²¹ 12 月，二姐美蓀和前往上海參加幼弟婚禮的英氏夫婦回到天津。²² 三姊妹

18 如柴小梵評呂美蓀「各體均雅潔，五古尤有盛唐氣息」，見柴小梵，〈呂眉生〉，《梵天廬叢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546。

19 李保民，〈呂碧城年譜〉，李保民編著，《呂碧城詞箋注》，頁 575-583。

20 呂碧城，〈予之宗教觀〉，《呂碧城集》，卷 6（上海：中華書局，1929），頁 62。又見英斂之日記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三日條（1904 年 5 月 8 日），「晡，接得呂蘭清女史一柬，予隨至同升棧邀其去戲園。候有時，同赴園，予遂回館。少秋來。晚，請呂女史移住館中，與方夫人同住，予宿樓上。燈下閒談，十二點少秋去，碧城女史書曩作滿江紅詞一闕，極佳。」見方豪編，《英斂之先生日記遺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頁 818。

21 英斂之日記光緒三十年四月初十日條（1904 年 5 月 24 日），方豪編，《英斂之先生日記遺稿》，頁 828-829。

22 英斂之日記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904 年 12 月 3 日），方豪編，《英斂之先

相聚於天津大公報館，與英氏夫妻大有相見恨晚之意。大姐惠如甚至還與淑仲訂下盟約，結為姊妹。²³

5月10日，在呂碧城入住大公報館的第二天，《大公報》「雜俎」一欄中就刊出呂氏的一首詞作〈感懷·調寄滿江紅〉，抒發其身為女子卻一樣憂國憂民的磅礴情懷。²⁴ 這首詞可以視為呂家四姊妹步入社會之初啼，但是與本篇更為相關的卻是附在其後、由潔清女史（即淑仲²⁵）所著的跋文。

歷來所傳閨閣筆墨，或託名遊戲，或捉刀代作者，蓋往往然也。昨蒙碧城女史辱臨，以敝簞索書，對客揮毫，極淋漓慷慨之致，真女中豪傑也。女史悲中國學術之未興，女權之不振，亟思從事西學，力挽頹風，且思想極新，志趣頗壯，不徒吟風弄月，摘藻揚芬已也。裙釵伴中，得未曾有，予何幸獲此良友，而啟予愚昧也。²⁶

儘管這篇跋文很可能由英斂之代妻所寫，但是，由於署名「潔清女史」，表明作者意在將碧城的詞作和潔清的跋文定位於閨閣文辭的範圍之內。而且，儘管作者試圖將呂碧城的詞作和傳統「吟風弄月，摘藻揚芬」之女性文學區別開來，但是，閨秀這一身分並未在根本上受到挑戰。可以說，呂碧城作為一位新舊雜糅的新派閨秀形象以此為始。²⁷

生日記遺稿》，頁927。1907年4月21日，四妹坤秀也來到天津，見英斂之日記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初九條，方豪編，《英斂之先生日記遺稿》，頁1098。

23 呂惠如，〈與淑仲二姐訂盟書〉，英斂之編，《呂氏三姊妹集·惠如文存》（天津：大公報館，1905），頁1；英斂之日記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六日條（1904年7月9日），方豪編，《英斂之先生日記遺稿》，頁851。

24 對於這首詞的分析，見 Grace Fong,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pp. 20-23.

25 英斂之日記中曾經記載「發內人潔清所書家信一函」，見光緒廿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條（1899年11月25日），《英斂之先生日記遺稿》，手抄體，頁39。

26 〈潔清女史跋呂碧城滿江紅感懷詞〉，《大公報》，1904年5月10日，版4。

27 如果將潔清女史對於呂碧城的評價放大來看，我們就會發現，這種通過對批判傳統才女文學技能而建立起的新女性形象，早在梁啟超的《變法通議·論女學》篇中就曾有过相似的論述。學者胡纓指出，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所推崇的這種新女性形象，其本質上是代表了一種中國的傳統與現代及未來的割裂。有關論述，見胡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

次日，《大公報》上又發表題為〈讀碧城女史詩詞有感〉的長篇論說，對呂碧城大加讚譽。和當時很多報紙相類似的是，《大公報》將對呂碧城的推崇放入到中國國勢衰微、女學不興的時代背景中進行闡釋。但是，其中一段話卻饒有深義：

聞女史年二十餘，博極群書，尤好新學，嘗悲中國之衰弱而思有以救之。其所志甚大，固不屑以善詩詞名，詩詞特其緒餘耳。並聞女史嘗對女友云：「吾中國古亦多才女，而唯以吟風弄月消耗其歲月者。蓋上無提倡實學之舉，故皆以有用之精神耗於無用之地。今國家如提倡女學，將來女界之人才當必可觀。此所謂時勢造英雄也。」女史之言如此，聞者莫不欽佩其卓見。²⁸

根據作者所記，呂碧城這位閨秀女子表現出一種明顯的褒貶態度：喜好新學，提倡實學，同時對「吟風弄月」的詩詞則表現出一種不屑的態度，以其僅是情緒的表達，於國家女學之事無益，因此，「不屑以善詩詞名」。但弔詭的是，就在前一天，呂碧城恰恰是依靠詞作開始進入到公共視線之中——儘管〈感懷·調寄滿江紅〉所表現的主題已遠遠超出傳統閨閣寫作的限制。不管呂碧城對於新舊時代的態度如何含糊矛盾，她仍然是將自己置於才女的文化脈承中進行定位。而這篇論說，在很大程度上將呂碧城的才女身分從前一天的閨閣話語公開轉變為一種時代的社會身分。緊隨碧城之後，惠如和美蓀也先後在《大公報》上吟詞撰文，一時之間大有並駕齊驅之勢。而她們在天津結交的士人官宦，以及通過閱讀詩文而得知其名的報刊讀者，也紛紛在《大公報》上發表應和文詞，讚譽追捧。

大約一年之後，由英斂之編校、大公報館發行的《呂氏三姊妹集》出版。英斂之在序言中開篇便提「呂碧城女士為前山西學政瑞田公之季女，甲辰暮春為遊學計至津，主予家。」這句話不僅將呂碧城的出走行為一筆抹去，而且首次公開點出呂碧城的家庭背景：呂氏是官宦之女。

中國婦女史研究》，期9（2001年8月），頁9-11。

28 〈讀碧城女史詩詞有感〉，《大公報》，1904年5月11日，版2。

這無疑為推崇三位呂家女兒的才情鋪墊了家學淵源這樣一種合理性。在評價三位女性分別在女權、詩詞、性格等方面的特點之後，²⁹ 英斂之在序言最後大為感慨說，「何天地靈淑之氣，獨鍾於呂氏一門乎？」在英氏看來，呂家女兒的才情，既有後天家學教育的影響，同時也離不開靈淑之氣的先天之性。該集中同時收入淑仲的一首題詞也表達了相似的意思：「此世最親惟我輩，得天獨厚是君家，苔岑契合神無間，水乳交融誼有加，邱氏一門饒蘊藉，劉家三妹並清華，沉沉女界數千載，一線光明麗早霞。」³⁰ 淑仲題詞中提及的邱氏一門應是邱荷香與其姊妹藕香、蓮香，而劉家應是著名的才女劉令嫻及其兩位長姐。因此，邱、劉之所指，仍然是以血緣和家庭為傳承關係的才女群體文化，這也恰好暗合了呂家姊妹的身分。要言之，英斂之夫婦對於呂氏三姊妹的推崇，一方面將三位年輕女性置於閨閣文化傳統之中；另一方面，也首先提出了三姊妹之才情，既有先天生成(inborn)之方面，也有後天習得(acquired)之要素。³¹

這種「承淵源家學，值過渡時代，擅舊詞華，具新理想」³² 的閨秀形象，逐漸隨著報刊媒體的發行以及呂氏三姊妹私交網絡的形成而鞏固。眾人之評論應和也日益豐富，儘管側重各有不同，或女權，或教育，或文采，或宗教，但就其根本，尚未脫離最早英氏夫婦為其所設置的這一大框架。如一位讀者在閱呂美蓀之〈書端中丞奏興女學事感言〉一文

29 英斂之評價碧城曰：「沉碧城能闢新理想，思破舊錮蔽，欲拯二萬萬女同胞出之幽閉羈絆黑暗地獄，復其完全獨立自由人格，與男子相競爭於天演界中」；評價惠如曰：「惠如詩詞，纏綿悱惻，怨而不怒，深合古風人之旨；其命意之高，琢句之雅，足徵其蘊蓄之所存」；評價美蓀曰：「眉生性豪爽，有古俠士風，言吐慷慨，氣度光昌，素不屑弄事詞翰；然落筆清靈，極揮灑之致，亦頗與乃姊乃妹並駕齊驅，各樹一幟。」英斂之編，《呂氏三姊妹集·序》。

30 這首詩其實是英斂之代淑仲所做，見英斂之日記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六日（1905年4月10日）條，「日前代內作題呂氏三姊妹集七律一章，錄後。」方豪編，《英斂之先生日記遺稿》，頁983。

31 “Inborn”和“acquired”：這兩個詞借自 Kenneth J. De Woskin, “Famous Chinese Childhoods,” in Anne Behnke Kinney ed.,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 63.

32 英斂之，《呂氏三姊妹集·跋》。

後，³³ 投稿《大公報》，讚譽美蓀為真才女、奇女子，並強調「女士家學淵源，一門風雅。」³⁴

這些對於呂氏姊妹的讚譽，並沒有止於天津和《大公報》，反而是隨著呂氏文著的轉載而延展出去。1905年，光明在上海《大陸》上發表文章，稱讚呂氏三姊妹「幼育名門，長嫻書史，才同謝女，早傳詠絮之詞。」³⁵ 民國肇始後，隨著呂家幾位女性足跡遍及各省，聲名日漸遠播，對她們的讚譽也不斷累積。1911年，上海《民立報》「文苑」一欄有詩盧應和美蓀之詞曰：「呂家三女一世奇，各樹壇坫稱女師。早歲流傳姊妹集，季呂更成遼東詩。」³⁶ 1929年，在呂碧城詩詞文集《信芳集》出版時，其至交好友凌啟鴻為之作跋，評價碧城「世為皖南望族，幼擅詩詞，精六法，工丹青。」³⁷ 這樣的溢美之詞，一直延續到1990年代《旌德縣志》修纂之時，編者仍然強調，「呂碧城姐妹四人，自幼受家學熏陶，皆以文才馳名。」³⁸ 家庭薰陶和家學淵源成為評價呂家女兒才情所必然提及的指示標準，如此自然、契合地嵌入到社會對她們的認同中，以至於成為一種跨越時間、空間和文體的界限，用來標誌呂氏姊妹才女身分的一個認證。這種將家學淵源視為理所當然的情境使得我們不得不轉向呂氏姊妹的家庭，分析究竟是怎樣的環境和教育，可以培養出四位各有性情的才女；而又是在怎樣的條件下，家庭成為社會認可的基礎。因此，本文下一部分，將具體展開討論呂家親子（包括父、母親）關係以及喪父、家變等變故，對於呂氏四姊妹童年和少女時期經歷和知識結構的影響。

33 呂清揚，〈書端中丞奏興女學事〉，《大公報》，1905年11月30日，版2。清揚乃呂美蓀字。

34 〈讀清揚女士書端中丞奏興女學事感言〉，《大公報》，1905年12月1日，版2。

35 轉引自李保民編，《呂碧城詞箋注》，頁545-546。

36 詩盧，〈為呂眉生女士題榆關攬勝圖〉，《民立報》，1911年4月8日，版6。

37 凌啟鴻，〈信芳集·跋〉，呂碧城，《信芳集》（北京：出版社不詳，1929）。本文除非另外指出，否則都是引自該版本。

38 安徽省旌德縣人民政府主修，《旌德縣志》（合肥：黃山書社，1992），頁569。

三、仕途籠罩下的親子關係

如果我們將家學(family learning)粗略地定義為代際之間由父母到子女知識的傳遞，強調其延續性，那麼，嚴格意義上說，呂氏四姊妹並非稱得上是家學淵源。根據呂父鳳岐(1837-1895)自撰的《石柱山農行年錄》所言，儘管旌德呂家多有躋身科舉、求得功名的子弟，但是鳳岐這一支卻寒素出身。「吾族為旌德之望，科名忝甲一邑，而我先世獨微，自八世祖會俊公為明季諸生，本朝以來悉貧，甚無操儒業者。」³⁹ 這種情況直到鳳岐這一代才有所改變。呂鳳岐自幼聰慧，父親為其開蒙，教授簡單的識字、詠物、訓詁等學問，後來將鳳岐送入村塾繼續學業，儼然成為全家人的希望。但是，由於太平戰亂的影響，呂鳳岐曾經度過了一段離鄉背井、以授課塾館或擔任文案才勉強得以為生的歲月。備嘗艱辛的呂鳳岐二十八歲（1864年，同治三年）中舉，此後仕途堪稱順利，四十一歲中進士，⁴⁰ 並先後在北京以內閣中書管漢票籤事（1874年），並擔任國史館校對官兼管理誥敕房（1875年）、內閣中書、玉牒館幫纂修官（1876年）、翰林院庶吉士、國史館協修官（1877年）等職。1882年，呂鳳岐出任山西學政，可謂達到其政治生涯的頂峰。

呂鳳岐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其在仕途上的起伏。1866年，剛過而立之年的呂鳳岐在中舉後，便娶鉛山蔣氏伯鸞為妻。蔣父卓人當時僅是秀才，並無顯赫功名。1872年蔣氏去世後，兩個兒子賢銘（生於1867年）、賢釗（生於1869年）被送回蔣家撫養。1874年，三十八歲的呂鳳岐在會試出闈後，由同年編修慶華延執柯，續娶了同省來安縣嚴朗軒次妹嚴士瑜為繼室。這便是呂家四個女兒的母親。呂鳳岐的第二

39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頁361。此行年錄由呂鳳岐撰至光緒十六年（1890年）五十四歲時，後由美蓀續編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呂鳳岐去世之時。美蓀的續編也可以看出其對於家史的關懷。

40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頁393。

次婚姻，不僅更為門戶當對，且一路平步青雲。1875年，長女惠如出生，呂鳳岐在北京擔任國史館校對官兼管理誥敕房。1881年，次女美蓀出生，呂家的經濟情況明顯好轉，在前一年已搬入位於南半截胡同的新家。1883年，碧城出生，呂鳳岐正在擔任山西學政。而到了最小的女兒坤秀於1888年出生時，呂鳳岐已經隱退安徽六安鄉間，不問政事。

相較於呂家飽受戰亂之苦、兄死弟離、只有呂鳳岐一人走上顯赫仕途，其妻嚴士瑜的家世似乎更為興旺一些。嚴夫人母親是武寅齊太守之女，父親在六十歲中舉，兩個兄長之中，長兄士琦（即嚴朗軒）為知府，次兄士瑄任知縣三昭和巡檢。⁴¹ 即使同樣歷經太平之苦，但嚴家並沒有像呂家那樣支離破碎，而且家人之中也沒有太多的死亡或者失蹤。

呂家四姊妹的幼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與父親呂鳳岐的政治起伏有關。粗略而言，呂父退隱六安前後，是呂家四姊妹幼年教育的第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呂鳳岐在仕途上的孤身奮鬥與嚴家的整齊壯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呂家女兒們在幼年教育方面更受到母親及其家族的影響。這一時期，呂鳳岐似乎並沒有將很多時間放在子女教育上。從我們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蔣氏亡故後，呂鳳岐將兩個兒子寄於蔣氏外家，直到十多歲才將他們帶回北京。這時，兩個兒子與父親已經非常陌生，「兩兒成童，各不相識，歡見之下，悲從中來。」⁴² 大致推斷，兩個兒子早期的啟蒙教育應該是在蔣家進行的。在將兒子帶回北京後，呂鳳岐曾經有一段時間親自教授二子。⁴³ 但是，這樣的父子互動似乎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兩年後，呂鳳岐自述因「家事甚煩」，便停止課讀，「延師課子，自攜一僕，假居城南太清觀，習靜以待考差。」⁴⁴ 留於家中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此時美蓀剛剛出生），應該是嚴士瑜來照料。數月後，呂鳳岐出任山西學政。

41 呂美蓀，〈先外王母嚴太夫人先從母余太夫人孝行〉，《薊麗園隨筆》（青島：著者自刊，1941），頁15。

42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頁395。

43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頁398。

44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頁398。

在呂家子女的早期教育中，呂鳳岐對於兒子和女兒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呂鳳岐對於兩個兒子，完全是一種傳統儒家規範中的嚴父形象。根據呂美蓀的記載，父親挈家帶口到山西擔任學政時，對兩個兒子督導極嚴。「每夜半揭其衾撲責之，兩兄必號哭奔逃於內室。吾母聞聲，雖雪夜不及披衣，立開門納之。」⁴⁵ 這樣的嚴苛教育，並非美蓀誇大之詞，後人也多有此印象。同為安徽人的胡適在為《清閨秀藝文略》作序中，就曾經特意提起呂鳳岐，認為他是「一個成功的八股家，他對於他的幾個兒子存著很大的期望，用種種很嚴厲的手段督教他們。兒子背不出書，要罰跪在大街上，甚至被牽出去遊街。」⁴⁶ 這樣緊張的父子關係，使得兩個兒子和繼母關係更為親近。⁴⁷ 同時，也可以理解為何日後幼子賢釗會因受不了父親對其「薄責」而自經身亡。

相較而言，呂父對於女兒們的態度似乎更為溫和一些。這或許是因為幾個女兒年齡還小，而且正是呂父事業得意之時。同時，也正如熊秉真所論，女兒一方面不需要像兒子那樣，繼承家族在科舉道路上的希望，另一方面，她們成年後就要婚配出嫁，因此，反而更容易受到父母的寵愛。⁴⁸ 當美蓀出生時，呂父特意騎馬從府衙趕回來，看望新生的女兒。「呱呱墜我鄉，鳳城今又至。大人在玉堂，珥筆金鑾侍。五月大雷雨，金蛇斬天際。人盡走欲藏，我乃迎墜地。大人喜添女，歸視突一騎，鐵門水正汪，瓊花濺蹄轡。聞之我母言，此實當日事。」⁴⁹ 後來在山西時，當時美蓀應該只有兩三歲，父親從衙署回來後，曾經抱著美蓀在庭園里閒步。⁵⁰ 但也必須承認的是，在呂鳳岐歸隱六安之前，我們並沒有發現太多這樣表現父女親密關係的材料。從呂鳳岐的行年錄以及呂美蓀的記述中，浮現出來更多地是一位謀求政治發展、對子女冷漠和疏離的父親的形象。

45 呂美蓀，〈蔣夫人示夢繼室〉，《菟麗園隨筆》，頁26。

46 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家〉，《胡適文集》，卷2（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148。

47 呂美蓀，〈蔣夫人示夢繼室〉，《菟麗園隨筆》，頁26。

48 Ping-chen Hsiung, *A Tender Voyage*, pp. 199-202.

49 呂美蓀，〈重至京師〉，《菟麗園詩》（青島：出版社不詳，1931），頁5。

50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菟麗園隨筆》，頁84。

1885年，在碧城兩歲、美蓀四歲、惠如十歲時，或許由於呂父已萌生退意，不願繼續為官，母親嚴士瑜便帶著三個女兒（兩個繼子情況不明）回到北京嚴家，和自己的父兄居住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這樣一個大家庭，構成了呂美蓀對於嚴家的溫馨回憶。當時，外祖母對於年幼的美蓀極為疼愛，不僅在衣食等日常生活中細心照料，而且還軟硬兼施、督促其學習上進。美蓀詩云：「我生在襁褓，依賴王母仁，衣之復食之，文繡章短身，四齡婢附塾，果餌誘頻頻。詭黠頻翹課，笞婢警其馴。」⁵¹

嚴家除了為嫁出的女兒和外孫女提供生活上的庇護之外，還為惠如和美蓀提供了最初的啟蒙教育。根據呂美蓀的記載，在外家居住時，四歲的美蓀和十歲的惠如和表兄們一起在嚴家家塾裡讀書，所學內容至少包括《三字經》和《千字文》最為普遍的蒙學讀物。⁵² 如美蓀所記，「四齡依母還京師，居住外家，隨外兄及吾姊入塾，性頗敏慧，五歲《三字經》、《千字文》已畢讀。」⁵³

由這段記述，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嚴家相當注重家庭教育，而且也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來聘請塾師在家中教授子弟。這與其書香門第的社會身分和經濟地位頗為符合。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對於幼小的女兒（七歲或者七歲以下，一說十歲或十歲以下），其啟蒙教育並沒有明顯的性別之分。⁵⁴ 幼小的女兒不僅可以和兄長們一起上學，而且學習的內

51 呂美蓀，〈重至京師〉，《菟麗園詩》，頁5。

52 關於《三字經》和《千字文》的分析，見 Pei-yi Wu,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Sung,"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eds., *Neo-Confucian Education*, pp. 322-324.

53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菟麗園隨筆》，頁84。

54 Ping-chen Hsiung, *A Tender Voyage*, pp. 205-207。一般而言，在晚清時期，很多中上層家庭都會允許女孩在及笄之前和兄弟一起接受啟蒙教育。如曾紀芬在十一歲時曾經和兄長在自家家塾接受初等教育。「是歲以後（十一歲），與仲兄秉誠公同從塾師鄧寅皆先生讀書。初讀論語，慮不能勝，乃改讀幼學。在塾不知用功，殊少成績。既而以鄧師之子來附學，格於內外之別，遂中止讀書。」曾紀芬，〈崇德老人自訂年譜〉，李又寧編，《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頁14。與呂碧城同時代的張默君、楊步偉、曾寶蓀等人也有過與姊妹兄弟輩共同入塾接受教育的經歷，張默君，〈默君自傳〉；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曾

容和兄長們並無區別。美蓀甚至因為聰敏過人，比表兄們更加受到老師寵愛。「外王母之孫（原注：嚴象賢上舍），於我猶手足，十年序見長，四齡忝共讀。師怒兄憐我，我偷驕以目。疾趨俯師膝，方字先已熟。兄每背誦之，謂報汝虐毒。」⁵⁵ 這樣的童年經歷，使我們意識到，家學的概念，往往並不是嚴格地按照父系進行傳遞。至少像呂家姊妹這樣的情況，更多是受到母親及母系家庭的影響。⁵⁶ 呂家姊妹住在嚴家的兩年中，惠如和美蓀的知識結構都得到了明顯的發展。美蓀用了一年的時間，讀完《三字經》和《千字文》，可以學到最為基礎的兩千多個漢字，並且藉助這兩本蒙學讀物的朗朗上口，掌握了最為簡單的韻律。而大姐惠如更是在十二歲時，「已有清映軒詩數十首」，⁵⁷ 這證明惠如至少是受到一定的格律和詩學方面的訓練。

對將來呂家女兒的人生道路產生更為重要影響的是，在這兩年之中，呂家和嚴家為呂惠如和嚴象賢訂下婚約，「迢遙十餘載，我姊奉巾服。外兄而姊夫，寡女絲盈軸。」⁵⁸ 這使得嚴、呂兩家在血緣關係外，更是在禮儀規範的意義上，變得密不可分。這樣的婚姻締結，嚴家是受益者。畢竟當時呂鳳岐的官職和權力更大一些。但與表兄的婚約，在很大程度上對呂惠如也是有利的。按照 Susan Mann 的觀點，這樣的中表婚好處有三：一是女方父母得以血緣關係為基礎，更好地保護女兒的利益；二是女兒對於嫁入的家庭有一定的瞭解，這可以減少婚姻中的壓力；同時，也可以擴大學術及姻親的網絡，以加強和維護兩家的聲名和財富。⁵⁹

在這段呂父退隱六安之前的生活經歷中，我們可以勾勒出一幅呂家幼女的生活圖景：父親在仕途晉升中偶爾為之的慈愛、母親及其家族在日常生活和學業啟蒙等方面的照顧和培養、以及對於女兒日後的設想和

寶蓀，〈曾寶蓀回憶錄〉，李又寧編，《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頁 241、298、641-647。

55 呂美蓀，〈重至京師〉，《菟麗園詩》，頁 5。

56 Susan Man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p. 228.

57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頁 410。

58 呂美蓀，〈重至京師〉，《菟麗園詩》，頁 5。

59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p. 62.

安排，其中占據決定性地位的，還是父親的角色。父親因晉身仕途而進行的遷移和所能夠花費在子女生活和教育上的精力，決定了呂家的女兒們在這一時期在什麼地方、以何種方式來接受最初的教育，更多地與嚴家聯繫在一起。因此，當呂父決定乞病退休、歸隱六安之後，呂家的親子關係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四、田園圖景中的親子關係

1886年初，呂鳳岐已經考慮隱退的問題，因此在安徽六安買下一個小莊子，這也說明呂鳳岐在官場上的奮鬥已經為呂家積累了足夠的經濟資本。不久，呂鳳岐辭去官職，帶著妻子、兩個兒子和三個女兒回到六安。「因念家本寒微，一入詞垣，驟膺使命，自維寡德，已屬非分之邀，倘再厲資游升，益懼弗克負荷。況賦性直傲，恥於苟同，於世亦不相宜，遂決計乞病退休矣。」⁶⁰但這種平靜的隱退生活並未能如願以償地維持下去。在鄉間生活的第一年，呂家就遭遇了很大的變故。

這一年，長子賢銘原本應該迎娶新婦，卻因連綿大雪堵住道路，只得改期；不久，尚未過門的新婦竟因病身亡。同年五月，幼子賢釗逃學，被父親責備後自經身亡，年僅十九歲。⁶¹賢釗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他和兄長自幼喪母，被寄蔣氏外家近十年，和父親並不親近。即使在後來與父親、繼母同住的歲月中，父親的呵斥和半夜的訓導，更增加了賢釗的敬畏和叛逆之心。再加上，呂家長子賢銘不愛讀書，反而更是「天富陶朱之才」，十五歲時就經商營利。因此，呂家在仕途上的希望似乎都寄託在賢釗一人身上。或許正是這樣緊張的父子關係以及延續家學聲名的巨大壓力，使得賢釗即使是得到一些「薄責」，也最終引發了「自經」的激烈行爲。賢釗的去世，使得呂父「痛悔之至，……憂鬱抱病者數月。」⁶²

60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頁406。

61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頁408。

62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頁408。

賢釗去世的第二年，呂家最小的女兒坤秀出生在六安。同年，呂父又為長子迎娶了汪家女兒。次年，長孫女出生。幼子的去世、長子的無心仕途、新生命的出現，種種因素糾集在一起，這使得呂父開始更多地關注家中三個日漸成長的女兒。長女和次女經過母親的課讀以及外家的幼年教育，才情已日漸顯露。在此基礎上，呂父聘請族人呂清臣擔任塾師，教導呂家女兒們的學業。同時，呂父還聘請一位徐司馬來教授繪畫。經過四五年的學習，惠如的繪畫「藝頗能進，先君略解憂焉」，⁶³ 美蓀在十一歲時，亦可「作四書題破題承題起講，十二歲作五言八韻試帖詩，俱為父與師所賞。」⁶⁴ 這一時期在父親與塾師督導下的學習，其內容已迥異於幼年時期在嚴家的基礎啟蒙知識。諸如四書這樣的儒家經典，以及從科舉考試的角度對於經典之解讀也被納入美蓀的教育之中。對於經典的廣泛研習和對於科舉考試的涉及，從任何意義上來說，都超出了一個普通的閨秀女性所應學習的內容。這種知識的越界，沒有遭到父親的壓抑，反倒是為父親所大為讚賞。事實上，美蓀對於父親讚揚的期盼成為她學習經典的主要動力。1892年，當呂家長子賢銘因病去世後，呂鳳岐更是頓失所依，於是越發關注女兒們的教育，投入更多的家庭資源來促進女兒們在學業上的發展。「先君自伯兄夭折，無以遣懷，日親督諸女讀。」⁶⁵ 在很大程度上，父親取代了童年時期母親和母系親族的角色，成為女兒知識結構的決定者和引導者。

相較而言，在四個女兒中，三女碧城受益於父親最多。當呂鳳岐決定回到六安時，碧城大約三歲左右，正是啟蒙的絕佳時機。而且，對於碧城而言，呂父不管是在時間上，還是在心境上都較對惠如和美蓀的成長注入更多心血。我們並不清楚碧城最初的啟蒙教育是如何進行的。有可能是母親課讀，教寫最基本的《三字經》、《千字文》，就像她的兩個姊姊一樣，長姊惠如也可能承擔起部分的教導之責。但極有可能，父親也參與了碧城的早期啟蒙。在桐城學者光鐵夫為推崇安徽名媛文化所

63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頁411。

64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菴麗園隨筆》，頁85。

65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頁410。

編輯的《安徽名媛詩詞徵略》中，提到碧城「五歲能詩、七歲能畫」，都是父親教導的結果。在碧城五歲的時候，有一日和父親在園中，父親看到園中的垂柳，吟出「春風吹楊柳」的五字對，當時在旁邊的呂碧城立刻以「秋雨打梧桐」來應對。⁶⁶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知識，作對子往往是父母長輩教導子女識物、押韻、字音、字意的基本項目之一。一般多從一字對開始，再逐漸增加字數。⁶⁷ 呂父的五字對，正是訓練碧城關於識物、對仗的能力。在這五字中，已經出現了動詞的「吹」，也遠遠超出了簡單的一二字對。而且，這一場景隱約投射了南朝著名才女謝道韞應和伯父謝安而作的「未若柳絮因風起」的名對：謝、呂作對時年齡相仿，而且，詠物這種文體也頗有相似之處。儘管光鐵夫這一記述有套用歷代才女能書善畫刻板印象之嫌，但是，至少可以看出，時人在構建才女特質時，傾向將這一過程歸結於父親（或男性親友）的教導。

又有一次，父親曾經給碧城一幅楊深秀(1849-1898)所畫的山水便面臨摹。⁶⁸ 換言之，這一時期父親對呂碧城的培養，不再是單純的識字格物，也開始進行氣質、性情的培養。呂碧城自言「予亦幼擅丹青」，⁶⁹ 正是父親這樣精心培養的結果。而兩位姊姊在與碧城年齡相仿時是否在嚴家受過相似的教育，並不十分清楚。事實上，這個臨摹山水的事例成爲後人用來驗證呂氏自幼便嶄露頭角的一個重要例證。光鐵夫在其《安徽名媛詩詞徵略》中，言呂碧城「七歲能繪巨幅山水」。⁷⁰ 他不僅將呂碧城才能展現的年齡具體追溯到七歲，而且更是將「臨摹」暗中挪移爲更有主動性、原創性的「繪畫」這一活動。五歲能詩、七歲能畫的說法，於是便一直流傳下去，成爲將呂碧城早現才女特質的例證。

66 光鐵夫，《安徽名媛詩詞徵略》（合肥：黃山書社，1986），頁208。該集初版於1936年。父（母）與子女對對，呂碧城並非個案。如與呂碧城同時代的張默君在其自傳中也曾提及和父母雙親之間的對對情景。見張默君，〈默君自傳〉，李又寧編，《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頁240。

67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98。

68 呂碧城，〈二郎神〉，《信芳集·詞增刊》，頁8。

69 呂碧城，〈玉京謠·紅樹室時賢畫集為陸丹林題〉，《曉珠詞》，卷2，頁36。

70 光鐵夫，《安徽名媛詩詞徵略》，頁208。

呂鳳岐不僅在學識教育上對女兒更為關注，在親子關係上也逐漸展現出較為頻繁的互動。根據呂美蓀的記載，在六安居住時，美蓀在十歲之前，整日逃學——就好像她的兄長賢釗一樣，讓家中婢媪頭痛不已。不僅如此，她還捉弄族叔兼塾師的老師和家中負責看門的老僕，著實是個淘氣的女孩。但是，這樣一個活潑甚至有些狡猾的小女兒，並沒有遭到父親的斥責。有一年正月，美蓀用爆竹將園中的太平水缸炸裂，並對父親說謊，稱是牆外兒童擲石所為，以免責備。而父親則驚慌問道「爾被擲乎？」當美蓀回答「未也」時，父親「喜曰：幸甚幸甚，可勿問。」⁷¹相較於在北京、山西時期的嚴父形象，這一時期呂鳳岐在女兒的心目中形象更為和藹慈祥。同時，從美蓀的生活來看，她可以捉弄老師，甚至可以出去河邊玩耍（儘管總是被阻止），還可以有一些無傷大雅的謊言。美蓀的記述刻畫了一個官宦家庭小女兒的活潑圖景，為我們理解閨閣女性的童年生活提供了鮮活的例証。

五、閨閣文化的傳承

以上，我們著重探討了父親在呂家姊妹童年及少女生活經歷中的角色和影響。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母親的淡化和消失。恰恰相反，除了加強女兒和外家的聯繫之外，母親還用其獨特的方式來鑄造著閨閣文化的特質，並且奠定了女兒們性格和思想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個方面，一是宗教虔誠的思想和實踐，主要體現在不殺生、仁慈、茹素等方面。二是夢境、宿命、因果等具有神秘主義色彩的體驗，在女兒們的眼中，這些經驗不僅與權威性的「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思想以及在19世紀晚期興起的時事、新學知識並行不悖，反而成爲她們思想的一種基本色調，以及她們詮釋自己人生經歷、進行自我身分定位的主要方式。第三，通過母系家史——尤其是母系中的女性家庭成員歷史的釐清和梳理，母親爲女兒們灌輸了貞潔、堅忍、孝順、和睦等有

71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薊麗園隨筆》，頁85。

關女性氣質的道德和性格，比直接的女性閨範經典之學習更深入地嵌入女兒們的記憶之中。不可否認的是，在呂家母女關係的圖景之中，仍有很多缺失的部分，比如說女兒們應該掌握的女紅知識、女性典範、纏足情況、嫁妝問題等。這樣的缺失，有可能是因為材料的局限，也有可能是因為對於一些文化禁忌（如纏足）的隱而不彰。但有意義的是，這樣的缺失可以反映出一種典範化、理想化的女性生活和實際女性所關注的議題之間的差異。

高彥頤(Dorothy Ko)認為宗教思想是上層家庭女性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影響女性世界觀和自我認同的形成，可稱為「家內宗教」(domestic religion)。⁷² 這一論斷同樣也適用於 19 世紀末期的呂家母女，尤其是在世俗佛教思想和觀念的傳輸方面。呂氏母女有一種清晰的放生和戒殺的思想傳統。放生於 16 世紀晚期開始在士大夫生活中占據一定位置。⁷³ 大約也是在同一時期，這一行為逐漸滲入閨閣之內，成為女性的一種宗教實踐。相較於士大夫們將放生視為一種社交方式以及教育大眾道德價值的責任，⁷⁴ 閨閣女性更多地將之視為以日常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底色。這一點很清楚地反映在呂美蓀的記述中。一日，母親嚴士瑜夢到自己在黃泉沙漠之中，被一頭羊和一頭豬兇猛地追趕，結果嚴士瑜以「向來不吃羊」和「再也不吃豬」應對，最後得以安全脫身。在夢醒之後，嚴士瑜便「常訓諸女曰：豬羊非為我一人而殺，其肉食且不可，況專殺雞鴨魚蝦乎」，強調一種全面的戒殺生觀念。不僅如此，嚴士瑜在庖廚之內也戒殺生，「故余家始無事庖廚不殺，其後即有事亦戒殺矣。」⁷⁵

就呂家母女而言，這種戒殺生和茹素的生活實踐，並非是源於對佛家經典的研習，而是以夢境將現世與黃泉聯繫起來的結果。這使得閨閣成為一個靈活的、具有想像能力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之內，女性因面對

72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p. 198.

73 Joanna F. Handlin Smith, "Liberating Animals in Ming-Qing China: Buddhist Inspiration and Elite Imagin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1 (February 1999), p. 53.

74 Joanna F. Handlin Smith, "Liberating Animals in Ming-Qing China," pp. 55-62.

75 呂美蓀，〈庖廚殺戒〉，《薊麗園隨筆》，頁 88。

另世的恐懼——而非內心的嚮往，最終選擇了折服。這種想像力，更是通過女性對於庖廚權力之掌握，延展至整個家庭範圍之內，成爲一種日常的生活實踐。呂母強調不殺生、對動物仁慈這樣的觀念在傳遞給女兒的過程中，不僅豐富了母女關係，加強了閨秀傳統的延續性，而且成爲日後女兒們生活中重要的宗教實踐。呂碧城後來皈依佛門，在海外大力宣揚戒殺，成爲「護生健將，佛學界之明星」，⁷⁶ 人人皆知。而二姊美蓀則早在1909年就反對殺生，認爲「殺生有罪，這是佛家下乘法的話，今慈善家不肯殺生，同是一理。」⁷⁷ 這些思想的最初源頭說是來自於童年家庭中母親灌輸戒殺生的觀念，並不爲過。

此外，在美蓀和碧城的文字中，還有很多記述關於母親、姊妹的夢境、命運等神秘主義經驗。這些經驗深刻地影響呂家四位女兒的自我感受與定位。就在呂美蓀出生之前，嚴夫人夢到一位窮酸秀才以及一個修補衣服的澣女。夢醒後，美蓀就出生了，嚴夫人意識到這位秀才和澣女是美蓀的前兩世，因此「默然不懌，知此女前兩世夙根太劣，必無福壽也。」⁷⁸ 就這樣，在美蓀成長的過程中，母親向來不甚喜愛這個女兒。當十二歲美蓀因學識「俱爲父與師所賞」時，母親卻「密語以夢，並訓之曰：汝三世面貌皆同，今爲吾女，固較勝於酸丁澣女，然勿再以點智損人，亟改前世罪愆，或可稍永壽祿，否則亦必三十歲左右貧困以死耳。」⁷⁹ 降生之夢，實爲中國很多文人才女所共有之經歷。像美蓀這樣有關前世的夢境，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成爲一種自我暗示，即自己的才能和命運是一種天命而非後天之因素，這頗爲暗合美蓀對於自我才能的定位。日後，當美蓀因父親去世、居住在來安外家時，曾經幫助舅父撰狀控告侵占祖田的鄰居，美蓀嘗言，「所奇初學撰狀若夙習焉」，就是在指其前世的窮酸秀才。⁸⁰

76 崔慧朗，〈可敬可佩之呂碧城女士〉，轉引自李保民編著，《呂碧城詞箋注》，頁563。

77 〈呂女士舌戰群英（一）〉，《順天時報》，1909年12月9日，版7。

78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薊麗園隨筆》，頁84。

79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薊麗園隨筆》，頁85。

80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薊麗園隨筆》，頁86。

三女碧城也有相似的經驗，當父親去世後，母親想要送碧城去當時在塘沽任職的舅父家接受更好的教育。「夙媚竈」的母親為碧城卜卦，得籤示曰：『「君才一等本加人，況又存心克體仁，倘是遭逢得意後，莫將偽氣失天真。」恰係勉勗遊子之詞。』⁸¹ 日後呂碧城以獨立之姿立於社會中，不禁認為母親的卦象暗合了自己的生活軌跡。「厥後雖未得意，而自此獨立為前程發軔之始。」這樣的預示性經驗，不僅被呂碧城用來證明自己獨立於社會的合理性，而且認為自己的才情是一種上天賦予的特性，自己的成名是一種順其自然的結果。

四女坤秀在母親去世後，曾經感受到母靈的存在，認為這是不祥之兆。因此，當後來美蓀極力邀坤秀去廈門女子師範學校時，坤秀以母靈示警為由，不願前往，但卻因受不過姊姊的力邀，只好前行，最終因瘴氣過重，生病逝於廈門。她認為，這果然驗證了母親的警告。臨死前，坤秀對美蓀說：「吾死陰靈必依諸姊左右。倘遇大事，即有警戒，勿不信也」，以母親保護自己的方式來保護姊姊。後來，果然有幾次，美蓀認為因受坤秀陰靈之護而逃過遭竊、火災等大難。⁸²

在呂家姊妹的知識框架中，這種預兆性和神秘性的經驗並沒有和儒家經典知識以及對閨閣外時事知識和新學相矛盾。恰恰相反，這些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呂家姊妹回歸預兆、因果的助力。呂碧城在其 1929 年文集《信芳集》中，曾花費相當篇幅探討靈魂、因果等內容，並且以自身經歷和報刊文章來加以驗證，以說服讀者。⁸³ 在這些文章中，呂碧城以其文字駕馭能力來論述本來無法以言語表述的因果現象及靈魂存在，反倒更是清晰地凸顯其對於神秘主義體驗的信服。這在很大程度上也說明其知識體系的包容性和複雜性，各種思想能夠平衡地糅合在一起。

更具說服力的是美蓀被撞事件。當 1895 年父親去世、家產被奪時，

81 呂碧城，《呂碧城集·鴻雪因緣》（上海：中華書局，1929），頁 61-62。

82 呂美蓀，〈母妹陰靈〉，《薊麗園隨筆》，頁 91-92。

83 如呂碧城於《信芳集·鴻雪因緣》中有〈閱報雜感〉篇談及母親曾告訴她有關靈魂的例子以及自己在上海居住時所親身經歷的靈魂事件，見《信芳集·鴻雪因緣》，頁 52-54。

美蓀曾向關帝和當地城隍神許下重誓，希望藉助這兩位神祇的力量以求家庭之平安。「余乃當天密焚疏於關聖帝君及本州城隍神，大意籲求脫離虎口，願終身而為女醫以養母，並誓庖廚永戒殺生。倘違誓，甘受極刑，聽罰斷首可也。」⁸⁴ 此後，美蓀開始在女學中擔任教習後，因廣讀新書，便以新學家自詡，並且對於鬼神迷信等大不以為然。「乃縱肆益以閱覽新書，極端排斥鬼神之迷信，大背往誓，揚揚然。以新學家自詡矣。且更作書寄母，謂母如信神佛，歸當以香爐踢翻之。」⁸⁵ 1906年8月，時任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教習的美蓀被電車撞斷左手臂，一度情況危急，後經治療，轉危為安。事後十年，美蓀突然醒悟，「手首同音」，十年前手臂撞斷，就是上天因自己違誓而給予的懲罰。只是神靈又是仁慈的，只讓左手受傷，並沒有奪去自己謀生的能力。「且左手也，無害於握管謀生，俾仍得自食其力，聰明正直之。」⁸⁶ 美蓀最後認為「徵神垂佑，曷由致之，此益跬步兢惕以自勵。」⁸⁷ 美蓀的這段論述，其遣詞清晰地反映出其從「關聖帝君及本州城隍神」，再至「鬼神迷信」，最後落筆於「神」這樣一個心理歷程。像美蓀這樣以新學之人物、女界之翹楚而冠名的女性，最終仍是回歸因果報應、鬼神天地這樣一種神秘性的體驗。

對於像美蓀、碧城兩位能夠自我表達的女性而言，這樣的選擇和回歸，並非隨意為之，而是一種批判選擇的結果。碧城在其《予之宗教觀》中嘗言：

世人多斥神道為迷信，然不信者何嘗不迷。何謂之迷，湮沒理想是也。舍理想而專務實利，知物質而不知如何以成為物質之理，致社會乏精神維繫而世道日趨於衰亂，皆此輩自稱不迷信者。……予習聞中西人言及神道輒曰：必有所徵而後能信，此固當然之理。然可徵信之處，即在吾人日常接觸之事

84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薊麗園隨筆》，頁86。

85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薊麗園隨筆》，頁86。

86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薊麗園隨筆》，頁87。

87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薊麗園隨筆》，頁87。

物，不必求助高渺聖經靈蹟，種種詭異之說，徒以炫惑庸流，惟自然物理方足啟迪哲士。……夫山林井灶，何有神祇。卜者誠虔，則亦感應。此即神道無往不在之徵也。

在這段話中，碧城著筆批判了兩種極端的信仰。一方面，「迷信」、「理想」、「物質」、「精神」等詞彙，很清晰地呈現出碧城所經歷的晚清新學啓蒙、新文化時期破除迷信、提倡科學等社會思潮的衝擊。只是在碧城看來，這樣的社會思潮，因其對於本源之「道」的無知，反而成爲社會混亂之根源。另一方面，碧城也不滿意那種「求助高渺聖經靈蹟，種種詭異之說」的信仰，認爲僅是一種迷惑庸俗之輩的手段。而碧城的宗教觀，則是一種對「神道」的敬仰。此「神道」特點有二：一是無處不在，二是需要虔誠信仰。這樣對於信仰的觀點，可以說已經超出其母親對於神秘主義體驗的觀感，更爲系統地成爲其思想的表達。

呂母對於四個女兒的影響，還表現在通過對於母系家史的梳理，灌輸有關貞潔、堅忍、忠孝等女性道德方面的教育。如前所言，呂美蓀在《菀麗園隨筆》中，以相當篇幅記述了自己家庭和家族的軼聞和歷史。相較於父親及父系家庭少得可憐的記述，呂美蓀更清楚嚴家的歷史，尤其是嚴家女性的歷史。這種知識的獲得，很可能源自母親的口述。同時，也可以看出，呂家的女兒和外家的關係相當親近。〈先外王母嚴太夫人先從母余太夫人孝行〉篇記述美蓀外祖母嚴太夫人孝順婆婆，甚至在婆婆去世後還經常擔心其屍骨在打雷天受到驚嚇。這樣的孝行，保佑了整個家庭安然度過了太平天國之亂，並且子孫在仕途上都有所成。而美蓀的從母余太夫人，儘管四處逃亡以避戰亂，卻仍然努力保存公婆的遺骨，日後也是家庭美滿。這兩則故事，都是突出了女性在婚後作爲「婦」對於夫家所做出的貢獻：延續夫家子嗣、保證兒子仕途順利、女兒婚姻生活美滿。換言之，女性爲「婦」對於公婆的孝順，以及在極端情況下表現出來的堅韌，成爲重要的女性道德標準，可以支撐起整個家庭，並使之趨向一種理想化的家庭生活。至於母親嚴士瑜，在目前僅存的兩首詩中，就有一首〈記夢〉強調不克孝養婆婆的遺憾：「自我爲婦來，不獲侍慈姑。昨夢高堂上，色喜淚盈裙。斂衽前跽問，竊聞處貧廬。子貴親

不侍，母乃戚無愉。爲婦奉蘋蘩，敢不中廚趨！慈顏亦莞爾，夢魂渺已無。」⁸⁸ 這種以謙和的態度和實際的操持來維持家庭和睦，也是傳統女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些有關自己家庭中祖輩、母輩女性道德的故事，以言傳身教的方式傳至女兒這一代，並被記錄下來，透過出版的方式流傳，正表現出惠如、美蓀這一代對於堅韌、謙和、孝順這些女性特質的肯定和嚮往。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這種女性道德的培育和影響，大都是以母親言傳身教、在日常生活基礎上進行傳遞的。目前，我們並沒有發現美蓀碧城等人提及對女性閨範等經典性的學習。在其成長時期，諸如陳宏謀的《教女遺規》這樣的女性閨範讀本曾經相當流行，並且至少再版過兩次，⁸⁹ 但是，呂家姊妹卻並無隻字提及她們曾經受過這樣的教育。

在這幅母女相傳的畫面中，所缺失的還有關於女紅方面的教育。清朝理想的閨閣女性，不僅要有像上述提及的道德品質，同時也要學習諸如紡織、刺繡、烹飪等實踐性知識，爲其婚後承擔起爲人婦的責任做好準備。「勤勉的生產性的手工勞動，尤其是紡紗和織布——對於上層女性而言，還有刺繡——對所有女性而言，都是一種婦德的標誌。」⁹⁰ 但是，目前我們沒有發現有材料提及嚴士瑜向四個女兒傳授關於針黹、縫紉、紡布、烹煮等體現女德的技能，更不用說帳目支出、管理傭人這樣有關家庭管理的知識。而且，當呂父去世後，幾個女兒以嫁入別家或者出外教授女學的方式來謀生，而非在家織布刺繡來換取生活必需品。這至少證明了呂家的女紅教育，並非她們生活的主要部分。或者說，呂家的女兒們對於自己所接受的學識教育和道德教育，更爲自信。日後美蓀嘗言：「余辛苦三十年，孤走五六省，出與公卿接席，入有書史爲歡，終勝於窮秀才縫窮女」，就很能說明這種與公卿、書史爲伴的得勝和自在。⁹¹ 這種以家學在社會中謀生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成爲晚清

88 光鐵夫，《安徽名媛詩詞徵略》，頁206。

89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pp. 28-29。

90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p. 14.

91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薊麗園隨筆》，頁87。

才女有別於晚明才女的重要方面。

在筆者看來，關於女紅教育的缺失，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呂家在呂父去世之前，家境相當優渥，從其新建的藏書三萬卷的長恩精舍就可見一斑。而且，根據美蓀自言，呂家「負郭有田二千頃，倉廩常豐未為貧。」⁹²這樣的家庭環境，可能使得父母親更加專注幾位女兒詩文書畫等學識的培養而並未將女紅放置於首位。其次，我們目前所能夠看到的關於呂家女兒們幼童年時期的資料，絕大多數都來自於美蓀和碧城寫於1920、30年代的回憶性文字。這一時期，在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城市化發展以及消費化思想的薰染後，紡布刺繡的女性技能似乎早已成為落伍的象徵。而且，二呂早已享有才女之名，對她們而言，通過文字表現自己的才學，要比記錄這些女紅的教育更符合自己的才女身分。

六、結 論

1895年，呂鳳岐因病去世，身後留下妻子嚴士瑜、二十歲的惠如、十四歲的美蓀、十二歲的碧城、七歲的坤秀、賢銘的新寡汪氏及其幼女。呂鳳岐的去世，不僅標示著這個家庭中最後一名男性成員的離去，同時，也使得妻女媳孫等眾女性喪失了經濟上的保障。⁹³族人以家產無男丁繼承為由，幽禁呂氏一門。美蓀歎曰：「先君見背，吾母以兩子早喪，性仁柔不能保遺產，族中之不肖者盡霸占所有，復幽禁余母女數人，月與銀三十，勉資衣食而已。」⁹⁴家中生活一落千丈。

隨著父親去世、家產被奪，呂家不僅物質環境有了劇烈的改變，更使得四個女兒的命運陷入了「才女=命運多舛」這樣一個人生窠臼中，她們的社會身分和人生經歷隨之發生劇烈的變化，昭示著那種無憂無慮童年和少女生活的結束。次年，惠如嫁入嚴家，與嚴朗軒之子嚴象賢結為夫婦，從呂家的女兒成為嚴家的新婦，開始了其人生歷程的另一階段。

92 〈呂女士舌戰群英（四）〉，《順天時報》，1909年12月12日，版7。

93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頁250。

94 呂美蓀，〈美蓀自記三生因果〉，《薊麗園隨筆》，頁85-86。

不久，嚴朗軒被調任塘沽，擔任鹽務方面的職務，兩夫妻也隨之遷去塘沽。目前，我們沒有資料來瞭解惠如在嚴家的生活究竟如何。但是，嚴呂兩家關係向來密切，再加之後妹妹碧城也來到嚴家，惠如的生活應該不至太過艱難。另一方面，嚴士瑜放棄家產，帶著三個女兒（寡媳和孫女情況不明）離開六安，回到了來安鄉間的娘家居住。嚴士瑜這樣寡居、沒有任何財產且帶著三個女兒住在娘家的身分相當尷尬。於是，二女兒美蓀在二十歲左右時，離開外家，先後到上海等地的女學中以教書謀生。儘管時人多以「女學先驅」之名冠之，但是，就其本質而言，美蓀仍是以通過教授自己所學的家學來維持生活，接濟母親幼妹，在新學教育家的光環之下，也是有著生活的無奈。

相較而言，四姊妹之中的碧城和坤秀，經歷了更多的人生挫折。原本與碧城訂婚的同鄉汪氏，在呂家經歷家變後，取消婚約，這對於自幼以才名出眾的碧城，無疑是個打擊。後來，或許是爲了像碧城自言那樣爲了「得較優之教育」，⁹⁵ 或許也是爲了避開退婚後的尷尬，碧城被母親送到塘沽舅父嚴朗軒家中，與惠如居住在一起，從承歡膝下的嬌女變爲寄人籬下的孤女。在塘沽時，碧城應該受到一定的學校教育。⁹⁶ 閒暇之餘，呂碧城也與一些女性親友和朋友交相往來，詩文唱和。⁹⁷ 但是，在舅父家的生活似乎並不如意，這從1904年呂碧城隻身出走、前往天津可見一斑。而最小的女兒坤秀在14歲時，被送至上海務本女學學習，這很可能與二姊美蓀在上海教學的經歷有關。在務本學習的過程中，坤秀的知識見聞得以豐富。⁹⁸ 碧城和坤秀的求學經歷暗合了晚清女學從家學到學校教育這樣一條發展軌跡。而兩姊妹自幼接受的家學教育，則使得

95 呂碧城，〈予之宗教觀〉，《呂碧城集》，卷5，頁61。

96 呂碧城在其〈訪舊記〉中言道，「庚申春，予客京師，嘗以事赴津，暇時訪同學女友於某小學校，蓋相別已十稔矣。」《呂碧城集》，卷1，頁5。庚申為1920年。

97 如1905年出版的《呂氏三姊妹集》中，碧城有〈長相思·寄郭曉雲姊〉和〈青衫濕·甲辰正月廿七日夜宴留別雪鴻二姊及夏玉貞萬葵容兩女士〉，《呂氏三姊妹集·碧城詞稿》，頁2-3。

98 呂美蓀嘗言，坤秀「年十四由皖赴滬，肄業於務本女學校，攻讀過苦，兼致力於算學，遂得咯血疾。」呂美蓀，〈母妹陰靈〉，《薊麗園隨筆》，頁89-90。

這一並軌過程相當順利。

不久，坤秀因健康狀況，回到來安陪伴母親，但是，嚴士瑜與坤秀又受到外家惡戚欺負，甚至到了服毒自盡、無以為生的地步。⁹⁹ 幸好被邑令灌救得活。短短數年之內，呂家的四個女兒各奔東西，往日同嬉之情景，不可復得。¹⁰⁰ 直至 1904 年，呂家姊妹在天津聲名漸起時，才再次相聚在一起，並且物質生活環境也相對改進了一些。就這一層面而言，儘管家變成爲一種事實上的斷裂，但是呂家的家學傳統並沒有得到中斷。惠如通過婚姻將其帶入夫家，美蓀以教書的方式得以謀生，碧城和坤秀則藉助家學實現了進入社會的轉變。

幼年喪父的經歷其實並非呂家女兒所獨有。與其同時代的很多人物如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也曾有過相同的經歷。對於這些男性而言，幼年時父親的去世不僅導致生活的拮据，而且容易使得母子相依爲命，共度難關，形成一種依戀的心態。但是，在其成人後，這種寡母依戀的感情往往轉變爲一種壓力，成爲束縛他們思想和生活的重要因素，他們無力掙脫，便轉而通過批判傳統來釋放這種被壓抑的情緒。¹⁰¹ 就某種程度而言，呂家幾個女兒表現出和這些男性相似的對於「寡母撫孤」的依戀情結。但是，呂家母女之間的感情似乎並沒有導致像胡適、魯迅等人那種對抗性的表達，反而成爲她們生活和情感世界中的重要內容。當美蓀在奉天女子師範學堂任教時，曾有機會申請公費出國留學，但是美蓀考慮到「卒以母老須養，勢難遠遊，」便放棄了這樣的機會。¹⁰² 最小的坤秀後來在辭去吉林雙城府女子師範學堂教習職後，「侍親居滬，貞孝不字。」當母親去世後，坤秀「搶地呼天，……幾以身殉。」¹⁰³ 後來坤秀在去世之前，希望美蓀將之葬於母親墓旁，並終得所願。要言之，父

99 呂美蓀，〈母妹陰靈〉，《薊麗園隨筆》，頁 90。

100 〈呂女士舌戰群英（四）〉，《順天時報》，1909 年 12 月 12 日，版 7。

101 姜海龍，〈試論新文化運動領袖的母親情結——以魯迅、胡適、陳獨秀為中心〉，胡春惠等主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遷》（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2004），頁 69-79。

102 呂美蓀，〈東遊緣起〉，《瀛洲訪詩記》（青島：青島市華昌大，1936），頁 1。

103 呂美蓀，〈母妹陰靈〉，《薊麗園隨筆》，頁 90。

親的去世，不僅改變了女兒們的物質生活和社會身分，而且在其心理層面上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記。那種無憂恬靜的童年和少女生活就此結束。

近代才女，或曰晚清才女，是一個內涵相當豐富的群體，而旌德呂氏四姊妹的個案，則為我們剖析這一群體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一方面，晚清才女大都實現了從家學到學校教育的轉變。她們不僅在空間上從閨閣步入學校，而且其家學往往成為她們獨立於社會的謀生手段和自我身分認同的主要資源。同時，藉助媒體報刊、出版發行的力量，才女之才名亦在一個更為廣泛的範圍內、以更為靈活的方式傳播開來。¹⁰⁴

本文則集中探討在呂氏四姊妹的童年和少女時期，究竟是怎樣的知識來源和資源，促成了其成人後的獨立及才名遠揚。在這幅景象中，女兒們的成長和父母雙親的家學教育有著密切的關係：父親對於女兒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女兒們接受教育的方式和場所。當父親忙於仕途晉職時，他無法給予子女們太多的關愛，這使得她們在幼年時期更多地是受到母親及其家族的影響。而當父親開始有精力和時間來關注女兒教育時，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家庭資源的投入，從經典和時事等方面對女兒們的知識結構進行導向，並且很快在她們心目中建構起一個偉岸的、權威性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父親為女兒們的成長提供了實質性的物質保障和象徵性的心理安全，使得閨閣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文化空間。在這個空間裡面，母親及其家族往往以「春雨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培養女兒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使得戒殺生、因果輪迴、堅忍貞潔這樣的觀念滲入到女兒的思想底層和日常生活之中。而當這種穩定的空間因父親去世遭到破壞時，幾個女兒的社會身分都會相應發生轉變，從事實上和心理上結束其少女時期。這些方面交織疊加在一起，以並行不悖的平衡構成了像呂家這樣近代才女的知識結構，提供了她們日後獲取才名所需要的各種養分，自由靈活地遊走於諸如「傳統」、「現代」、「新學」、「迷信」等各種範圍之間，形成自己所特有的社會身分。

104 對近代才女「晚清性」的理解，得益於匿名審稿人的建議，在此感謝。筆者希望日後有機會，能繼續深入探討這一論題。

徵引書目

一、報刊

《大公報》，天津：大公報館，1904-1905。

《民立報》，上海：民立報社，1911。

《甲寅》，北京：甲寅週刊社，1927。

《教育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順天時報》，北京：順天時報社，1909。

二、文集

方豪編，《英斂之先生日記遺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4。

光鐵夫，《安徽名媛詩詞徵略》。合肥：黃山書社，1986。

呂美蓀，《菟麗園詩》。青島：出版社不詳，1931。

呂美蓀，《菟麗園隨筆》。青島：著者自刊，1941。

呂美蓀，《瀛洲訪詩記》。青島：青島市華昌大，1936。

呂碧城，《呂碧城集》。上海：中華書局，1929。

呂碧城，《信芳集》。北京：出版社不詳，1929。

呂碧城，《曉珠詞》。臺北：廣文書局，1970。

呂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李保民編著，《呂碧城詞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英斂之編，《呂氏三姊妹集》。天津：大公報館，1905。

三、專書

安徽省旌德縣人民政府主修，《旌德縣志》。合肥：黃山書社，1992。

胡適，《胡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胡鈞，《張文襄公（之洞）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柴小梵，《梵天廬叢錄》。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 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
-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 劉納編著，〈《呂碧城：評傳、作品選》〉。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 Fong, Grace, Nanxiu Qian, and Harriet T. Zurndorfer, eds. *Beyon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Gender, Genre, and Cosmopolitanism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04.
- Hsiung, Ping-chen.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Hu, Ying. *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9-191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Judge, Joan. *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The Past, the West, 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Ko, Dorothy.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ann, Susa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ann, Susan.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Mungello, David E. *Drowning Girls in China: Female Infanticide Since 165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 Widmer, Ellen and Kang-i Sun Chang.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四、論文

- 姜海龍，〈試論新文化運動領袖的母親情結——以魯迅、胡適、陳獨秀為中心〉，胡春惠等主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遷》〉。香港：珠海學院亞州研究中心，2004，頁 69-79。
- 胡纓，〈歷史書寫與新女性形象的初立：從梁啟超『記江西康女士』一文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9，2001 年 8 月，頁 1-29。

熊秉真，〈好的開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2，
頁 201-238。

Furth, Charlotte. "Concepts of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Infancy in Ch'ing Dynast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6:1, February 1987, pp. 7-37.

Leung, Angela Ki Che.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In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381-416.

Mann, Susa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 in the Mid-Ch'ing Period." In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9-49.

Smith, Joanna F. Handlin. "Liberating Animals in Ming-Qing China: Buddhist Inspiration and Elite Imagin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8:1, February 1999, pp. 51-84.

Waltner, Ann. "Infanticide and Dowry in Ming and Early Qing China." In Anne Behnke Kinney ed.,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p. 193-217.

Woskin, Kenneth J. De. "Famous Chinese Childhoods." In Anne Behnke Kinney, ed.,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pp. 57-78.

Wu, Pei-yi. "Educ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Sung."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eds.,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307-324.

The Construction of Talented Women's Girlhoo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the Lü Sisters of Jingde, Anhui

Fang Qi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I construct a picture of talented women's girlhood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using the four Lü sisters from Jingde, Anhui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I will explore what kinds of materials these four sisters received for their education, and how these elements contributed to their reputation as talented women when they grew up. I argue that each parent played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role in their knowledge 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as an authoritative image in their childhood, their father decided how they were comprehensively educated and to what extent. He was also a bridge that connected the inner chamber of the daughter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Meanwhile, the death of their father dramatically changed his daughters' self-perception and their life trajector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ir mother represented a more universal and moral knowledge source. Her ideas on not killing, karma, and feminine virtues set the basic tone for her four daughters and thus transmitted the inner chamber cultur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talented women, girlhood, knowledge structure, women's culture